

为思想史研究寻找基点

——读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

令狐兆鹏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金观涛、刘青峰以观念史的视角整合思想史,运用数据库调查法和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追寻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关键词涵义、出现频率、以及词语之间差异之变化,解构了传统历史观的统一性,力图寻求历史的真实性、复杂性。同时试图寻找观念史变化之原因,提出了以二元论意识形态为枢纽的现代思想史三段论,为思想史研究寻找到新的基点。

关键词:观念史;知识考古学;二元论;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2)01-0131-04

一、什么是观念史

目前,历史学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分裂,传统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存在着客观必然性,以因果关系为链条构成了一系列单线、有序、进化的历史。而通过对史料的挖掘、考据、勘探,人们终究会发现“真相”。后现代历史学家则认为,历史并不存在“客观必然性”,历史是一种隐藏着权力的话语叙述,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客观实在性只不过是话语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叙事而已。历史学家柯文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必定比人们想要相信的历史实情更有价值,这种观点本身也许只是一个神话。”^{[1]258}福柯认为代替传统史学著作“整体性”、“真理”及“关联性”等被奉为圭臬的,应该是对历史的“不连续性”、“断裂现象”及“事物四散分崩”的寻求,如此方能重新组织对过去“知识考古式”甚或是“探源研究式”的了解。

到底有没有一种真正客观的历史,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历史都是一种叙事的话,人们史学研究的基点又在哪里?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历史是存在真实性的,而真实性的基础来自于“观念”——“我们在

研究历史事件的记录时,必须去寻找导致该事件发生的支配参与者行动的普遍观念。研究支配历史事件的普遍动机和思想原因,实质上是研究者在自己心目中重演该事件发生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类似于受控过程作思想实验。”^{[2]439}可见,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影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也不是历史当事人的情感经验左右历史的真实,而是说历史的真实来自于人们当时理解事物的观念。正是观念构成了人们认识的可重复性。因为可重复性是人们理解事物的基础。

自然科学的真实来源于“受控性原则”,即当人们重复性地认为一件事发生时,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社会科学的真实性来源于“拟受控性”——“当历史记录是人的行动或社会行动时,阐明支配该社会行动发生的价值系统和观念(包括行动后果如何反作用于观念),是呈现历史事件真相的前提。”^{[2]439}作者认为,可以用受控原则来表达经验的可靠性,而基于观念基础上的“拟受控原则”,同样可以传达经验的可靠性,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逻辑关系进行因果推理。“历史研究中鉴别真实性依靠的是‘拟受控实验原则’,即是把史实转化为观念史

收稿日期:2011-03-05

作者简介:令狐兆鹏(1978—)男,山西临猗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图像中的事件,并用事件的可理解性代替受控实验的可重复性。”^{[2] 447}刘、金二人认为,观念史中的事件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仅仅与个人观念有关的事件)和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超越个人记忆而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系统的事件)。历史的真实性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因果关系而组成的普遍观念史事件。后者是通约的,前者是不通约的。而后现代史学的错误就在于“完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偷换,先把观念史图像中事件中的普遍观念换成了个人持有的独特观念,进而再把观念转化为个人心灵感受和不可沟通的价值表达”^{[2]470}。

当后现代历史学家称历史为“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时,他们强调的正是把历史叙事视为圭臬的荒诞。换句话说,因为历史作为一种叙事,它恰恰遮蔽了意识形态话语。当历史学家在删选历史材料、撰写历史传记、编纂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要追问的不是他们运用材料的准确与否,不是他们声称的史实可靠与否,也不是他们所宣扬的真理正确与否,而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决定了他们要这样而不是那样选择材料。通过对于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无形之手”的追问,我们发现历史学家貌似“公正”的虚假性。福柯的谱系学正是对于号称历史的“真实性”的致命一击。他说“传统历史在面向过去时,是在历史的总体性中去把握过去,它让我们追溯过去时把它看作一个被动的连续运动,这些东西都必须予以系统地铲除。”^{[3]157}如此,“历史事件就不是一次决定、一项条约、一段统治,或一场战斗,而是相互对立的力量构成的一种关系,是被篡夺的权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一种使自身脆弱、松懈,并毒化自身的支配,是一个带着面具的‘他者’的出现。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既不是由命运,也不是由机制所控制的,而是战斗导致的机遇的结果”^{[3]157}。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平整、光滑、单一、有目的的叙述,而是充满斗争的、复杂的、偶然的各种力量的博弈。后现代史学否定的不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客观性,而是历史宏大叙述的虚假性、荒谬性。他们要拆除的正是历史叙述貌似真实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这种传统历史叙述背后隐藏的是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一统天下的霸权性。

二、观念史的知识考古

通过“观念史研究”,作者建立起一套庞大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系统)这个包含了大约一亿两千万字的文献数据库

以20世纪政治思想史关键词为中心,分别对重要的概念进行时间分布上的统计,并根据其不同的意义归类解读,从而找到一份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时期的观念史地图。作者在书中考察了“真理”、“科学”、“民主”、“个人”、“权利”、“社会”、“革命”,以及“经济”、“世界”等十几个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关键词在期刊、典籍中使用的频率、以及涵义如何发生变化,进而探讨这些关键词变化背后的内在原因,力图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做出全新的解释。

这种思路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是断裂的历史,“考古学不想把连续给出的东西当作同时存在的东西;它不想凝结时间,不想用略述静止图案相互关系来代替事件的时间流动。考古学怀疑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连续性是绝对的东西:一种话语由于其限定法则而经受的首要的、不可分割的次序”^{[4]93}。换句话说,以往历史学把历史当作连续的演变过程,或是向上的进化,或是下降的退化,或是永恒的循环。正因为如此,传统史学执着于追寻因果关系。而知识考古学恰恰相反,它只是“注意发生历史事件的当时的实际情况,集中分析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一切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把它们当成动态的和相互关联的网络”^{[5]99—100}。历史通常有两种写作方式:一是根据现在来书写过去,即把现在的概念、制度、模式强加到过去,强加到其他时代,然后声称发现了这些早期的概念、制度所具有的现在意义。二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在过去的某一点发现现在的核心,然后揭示从那里到现在发展的必然性。福柯却认为历史是没有终极目的的,不是按照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观念展开的。

在《观念史研究》一书中,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作者对于每个关键词在中西语源学的知识梳理、每个时间段涵义变迁分析、词语之间差别分析等知识网络的编织手法处理上。一旦词语回到具体语境,就像鱼儿回到大海里,顿时会产生无穷的魅力。比如,我们常常把“民主”和“科学”当作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以为二者是在全盘反传统中确立的两种全新的价值。困惑我们的是,回顾百年历史,为何“科学”迅猛发展,而“民主”建设举步维艰。作者通过检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科学”两词的使用频率,发现当时“民主”使用远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普及”,而且,“科学”一词为正面意义,“民主”一词多为负面意义。“科学”一词的频频使用正是中国追求现代化、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然结果。换

句话说,进化论的史观促使中国在科技方面不断学习西方。作者通过数据库分析告诉我们,“民主”一词在1904、1906、1909、1913年出现使用高峰。据考证,“民主”的含义相当复杂,简而言之,共有四层:第一,民之主;第二,人民统治;第三,与世袭君主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第四,外国民选的最高国家领袖。1900年后“民主”主要指“为人民支配、民主政治参与之意”。但是,由于民初宪政的失败,人们对于“民主”屡作批评。当时“共和”、“立宪”的使用次数远远高于“民主”。关于民主制度,张灏曾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过程中,侧重的是共和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民主”、“共和”、“立宪”等词语的使用状况、含义变化可以解释历史的复杂性,一种被压抑的思想得以呈现。

再如,“革命”一词的变迁也颇为复杂。20世纪初期“革命”一词出现三次高峰:1903年出现“革命”第一次高峰,第二次高峰出现在1906年,1923年到1927年出现第三次高峰。这样,作者把“革命”观念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第二阶段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和逆反价值注入传统观念的结构,这一阶段“革命”一词摆脱“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意义,获得西方革命观念中进步、彻底变革、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等种种现代含义”^{[2]398}。第三个阶段出现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五四以后,形成了以中国当代革命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并且重新实现社会整合,中国由以儒家伦理为根据的传统社会演变为由革命意识心态统摄一切的政党—国家。这样,“革命”的丰富性充分展现出来。一旦把“革命”意义“还原”,作者就会发现很多“洞见”。

同时,作者并没有彻底追寻知识考古的思路,该书仅仅做到了对于历史观念的内涵还原,即设法回到观念想象的本身。词语在碰撞、摺叠、转换中展现丰富的含义,而这些都是被宏大历史压抑了,因此,《观念史研究》无疑是一种传统历史之解构。但是,作者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传统史学之解构,更大的抱负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历史观。

三、重绘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地图

作者的建构是以二元论意识形态为基点的。作者认为,1895年至1915年为二元论意识形态时期:“所谓二元论意识形态,是指将传统个人道德、儒家伦理与公共领域之理(包括宇宙秩序)划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从而打破了社会领域的“理”必须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导出的结构。……在传统的常识

理性结构中,社会公共领域之理是从儒家道德推出,西方公共空间之理和儒家伦常等级不兼容。如要克服这种内在的冲突,唯有将社会公共空间与个人家庭伦理划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领域。这样,在私领域传统儒家伦理仍然维系君权、神权和族权的合法性,而在社会公共领域则可用来自西方的理支持新政和立宪。”^{[2]54}正如同找到一个基点,阿基米德可以撬动整个地球一般,二元论意识形态也构成作者研究思想史的一个基点。如果说以观念史研究代替历史研究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的话,那么以二元制意识形态为20世纪初思想史基点的洞见则改变了整个思想史研究的面貌。

作者以二元论意识形态为基础,开始重绘20世纪思想史的地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观念史的研究,作者划分了当代观念形成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选择吸收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甲午后到新文化时期前的二十年(1895—1915年),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观念时期,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二元制意识形态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1919年以后,是中国当代观念形成时期。

第一阶段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一元制社会。虽然我们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步伐,但整个社会的观念仍是传统的,人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绅士自治的民间社会。第二阶段划分别具新意,它打破了人们以往以辛亥革命来断代的传统。一旦把1900到1915年划分为第二阶段,也就暗含着这一时段社会观念结构是不变的,也即上文提到的二元制意识形态。第三阶段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因为1915年左右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以否定和抨击代表绅士利益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第三个阶段打破了结束二元论意识形态之后,造成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打破了儒家意识形态在私人领域的统治,西方关于自由、权利等启蒙主义话语深入传播;第二,公共空间受到了空前挤压。“人们一旦否定中西二分意识形态,也就取消了这两个领域的分界,不仅意味着现代化学习机制的失败,而且重返天人合一结构,从此,由私合成公的机制再不可能存在,公共空间在中国丧失社会转型和整合功能。”^{[2]92}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可分成两个阶段:从1915年至1919年为第一阶段,其主调为批判儒家伦理,新知识分子代替城市化的绅士成为政治文化主体;1919至1924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新政党意识形态兴起。通过数据图分析,作者认为

这两个阶段正好是国家开始吞没私人领域的历史过程。“随着知识分子认同新形态,新的公共价值就可以不断扩张,吞没家庭和个人,中国出现了一个新意识形态称霸整个社会、家庭,乃至个人领域的新时期。”^{[2]216}

重新分期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比如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走向世界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传统教科书也把辛亥革命看作革命派对改良派以及保皇派的胜利,似乎革命风潮在当时已经风起云涌。但是数据图分析表明,辛亥前十年革命思想传播两次高峰在1903年以及1906年,前者发生拒俄运动高潮,后者则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大辩论时期。1911年“革命”使用频率陷入低谷,证明了辛亥革命作为“观念史”事件,并不具有“革命”性意义。辛亥革命与其说是革命派完成的硕果,毋宁说是绅士力量与皇权力量角逐的必然结果,是二元制意识形态内部公、私领域两股力量的博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再如,我们只看到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却无法解释为何如此。作者认为无论清廷新政、预备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二元制意识形态是学习西方工具理性和现代思想、实现传统文化转型的基本框架。民初共和尝试带来政治秩序大混乱,人们在反省西方政治体制时,必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私领域保护的旧绅士阶层的二元论。传统儒家思想是绅士意识形态之核心,反儒势在必然。“儒家伦理在私领域对家庭之主宰,其后果是中国人丧失个人自主性,表现在公共领域,就是国民性出了问题;家族本位才是造成中国问题的原因。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中新一代青年的普遍观点。……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个人观念也被重构。”^{[2]169}

最后,作者提出了新文化运动“重构说”。以往我们都谴责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断裂,但是,作者认为历史并没有断裂。作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所反对的,主要的并不是宋明理学,也不是清代实学,而是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2]21}新文化运动虽然号召全盘反传统,进行思想启蒙,但其思维模式与传统的道德一元论暗通款曲。1920年代政党意识形态独霸天下,个人、权利、民主等启蒙思想被无形压制,我们又仿佛回到了传统。二元制意识形态打破了第一时期一元论意识形态,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了第二时期

二元论意识形态,回复到一元论,这样20世纪中国思想史就形成了合一—分—合一之趋势。

很明显,作者想用一种新的单线的、平整的、宏大的历史观代替陈旧的、进化式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观。但是,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对象享用的是同一个目的,即历史是一个完整的、圆润的有机体。作者在解构历史的“谱系”时又在建构“观念”的“体系”。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体系”并非福柯所说的“谱系学”,或者说它背离了福柯的谱系学思想。福柯说“谱系学并不妄称要回溯,重建一个超越了被遗忘的事物的散布状态的宏大的连续性;它的义务不是要证明,过去在现在之中积极地发挥作用,继续秘密地赋予现在以活力,也不是在昔日的所有兴衰成败之上强加一种从一开始就已勾划好的形式。”谱系学绝非是回溯一个起源,重新勾勒一种必然规律性的东西,“谱系学导向的历史,不是寻找我们统一性的根源,相反要尽力消解它,不是确定我们源初的唯一策源地,那个形而上学家寓言我们必将回归的最初决定,而是致力于昭显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非连续性”^{[3]163}。

总之,《观念史研究》一书以全新的观念史理念、知识考古式的研究方法重新考量20世纪思想史,还原了历史观念的复杂性。作者并不满足于解构传统知识,而是想在解构的过程中完成新一轮别具新意的建构。或许是过于匆忙,或许力有未逮,作者对观念史的建构仍有许多破绽需要修补。如果能在该书中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再清晰些,而不仅仅是用“大规模融合外来文化”概括那么简单的话,可能会更完美些。毕竟历史是复杂的存在,任何化约式的概括都会淹没、遮蔽更多的可能性——福柯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柯文.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2] 金观涛, 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 [3] 福柯. 知识考古学引言 [A]. 杜小真编. 福柯集 [C].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 [4] 德莱弗斯 P·拉比诺. 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2.
- [5] 高宣扬. 福柯的生存美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